

美国媒体敌视中国的原因

范士明

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波动、调整时期,双方对彼此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而在各自国内,各种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所有公开表达的观点不见得立即转化成政策,但都毫无疑问地构成两国相互作用过程的一部分,并使政策调整具有了舆论基础。本文具体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过程中,美国大众传媒塑造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造成了哪些后果或影响?美国媒体为什么如此描绘中国?媒体的表现与对华政策有什么联系?文章试图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的初步分析,寻求两国关系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轨迹。

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

总体来说,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是由主流媒体引导的。所谓主流媒体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一般是指既具有相当数量的受众,又具有相对来讲公认的权威性、代表性,可以反映精英看法、引导舆论或影响政策趋势的那一部分媒体。在美国,四大全国电视网(ABC、NBC、CBS、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往往被视为影响较大的主流传媒^①。本文大致将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从内容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的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状况;第二类有关台港澳、中外关系、中

国对外政策等;第三类包括对华政策评论及社论。当然某些报道会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几个方面。本文资料主要选取自1995年6月到12月的《纽约时报》,包括这段时间所有以“中国”为主题的报道403篇(实际有效377篇^②)。所选时段不具特殊目的。假设该报在选定时段内的中国报道与美国主流媒体90年代的中国报道总体表现基本一致。

在第一类报道中,美国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他们的报道集中在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售犯人器官和劳改产品”,外国公民“遭受便衣或警察骚扰”,“政府官员腐败”,“西藏问题”等。在经济方面,它们主要把重点放在外国公司在华遇到的障碍和不公正待遇,或不准确地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及成就作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在内容比例、篇幅、版面等方面明显超过正面报道,从而使人们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失衡。以经济方面的对外经贸合作为例,在总计43篇报道中,有30篇均为简讯,从而大大缩小了这一部分所应显示的中国经济开放全貌。再以当年的世妇会报道为例,24篇以中国为主的报道中,16篇是关于所谓中国给大会设置障碍的。

在第二类报道中,美国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核试验与核扩散,导弹及其它武器出口,购买先进武器,香港能否保持自由及自治等。它们故意忽视或用

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力图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怀有野心、不满现存国际状况”的国家，一个不愿遵守国际贸易、军售规划、不负责任的国家，一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国家。

在第三类报道中，美国媒体经常批评甚至咒骂中国的内外政策，指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坚持“原则”，态度不够强硬，鼓励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甚至制裁、遏制中国。它们的专栏评论、社论和来信，几乎一边倒地敌视中国，为由人权活动分子、亲台分子、贸易及劳工保护主义者和遏制论者结成的反华联盟说话，其他声音只占极小的比例。在统计到的20篇社论中，没有一篇说中国的好话；在35封读者来信中，只有两、三篇主张与中国对话，七、八篇属于联系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中性报道，其余全是攻击中国、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

它们在报道中经常使用容易引起美国人敌意的标题、词汇或漫画，如“共产党国家”，“独裁政权”，“天安门大屠杀”，“下一个超级大国”，“民族主义”，“威胁”以及张牙舞爪的龙或狮等，以加深读者的印象。有关中国的报道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宏观的背景分析，经常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大众传媒在美国公众中把中国塑造成了这样一个形象：内部缺乏合法统治、践踏人权、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经济又在迅速发展；在国际上不认真遵守贸易和军售规则，扩充武库、威胁弱邻，具有严重民族主义情绪、不满现存国际秩序；在中美关系中享有大量贸易顺差、威胁美国经济安全，长远来看有可能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念上全面与美国对抗。

对于美国媒体明显偏颇的中国报道，美国一些官员和学者颇为忧虑。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前助理国防部长奈，驻华大使尚慕杰，中国问题专家李坎如等都曾批评美国媒体片面报道甚至过分仇视中国，呼吁不要误导美国人，把中美关系引入歧途。

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东亚人士也要求美国媒体停止推销中国威胁论。

美国媒体大规模长时间地丑化中国引起了中国官民两方面的强烈反应。1997年1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批驳美国新闻媒体固守冷战思维，攻击中国，借题发挥，误导视听。中国外交部官员在为外国驻京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要求美国记者不要片面注意负面报道而应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一些普通青年知识分子撰文著书批评美国媒体对中国实行“妖魔化”。《中国可以说不》也有奋起反击美国媒体的意味。在美华人对美国媒体的表现也十分不满，突出的例子就是1996年夏针对NBC的奥运报道展开的广泛抗议活动。事实上，美国媒体所关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原因之一正是对其中国报道的反弹。

造成极端偏见的四个持久性原因

1. 美国式的新闻运作和对主流媒体的跟从。新闻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业者们头脑中的概念。托马斯·戴伊在《谁统治美国》中说，记者说是新闻就是新闻，按照记者的标准值得了解的事就是新闻^①。著名美国政论记者李普曼认为，新闻和真理有很大区别，因为新闻中充满了主观因素^②。根据美国研究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资深学者的观点，美国式的新闻除及时、简洁外，还要新奇、吸引人；统计数字则表明，在国际事务方面，美国的新闻除去要员出访以外，涉及最多的是示威、动乱、政变、革命、灾难、独裁、冲突、战争等^③。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迎合读者和既定的价值体系以扩大发行量，媒体更乐于寻找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负面报道。即使所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不例外。另外，美国媒体认为自己天生肩负的就是批评、监督别人的责任，不是“唱颂歌的”，这更增加了负面报道的比例。媒体本身

主要靠“自律”和观众“有选择地接受”加以约束,实际上成了一种难以被监督的权力。如果认为美国媒体以客观真实为天职,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几近相同的事件(如前苏联击落韩国客机与美军击落伊朗客机)在其报道中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处理。

在国际报道方面,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原因有三点。首先,独立报道国际新闻成本高昂,非中小媒体所能长期负担。据统计,全美一千五六百份日报中,只有约百分之一的报纸拥有自己的驻外记者,大部分依赖美联社、合众社和其他大报,而四大电视新闻网提供了中小电视台约90%的新闻^⑥。其次,一些享有“严肃”、“权威”声誉的媒体,与政界学界的活跃人物关系密切,可以经常发表引导性舆论,影响政府和公众。最后,8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传播行业迅速走向集中,少数大公司主导传媒,导致信息源也趋向集中。上述原因造成的后果是,在国际报道上,全国性的国际新闻报道往往呈现“类同性”,而非“差异性”,同样的信息,类似的解释,很容易形成一个声音^⑦。

2. 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反映了中美两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美国人看待别国“好坏”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该国是不是“自由、民主”国家。长期的冷战,又使美国人视共产主义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养成了对外事务以反共为第一要义的习惯。冷战结束以前,前苏联就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苏联因素”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很多美国人看中国时而忘记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并幻想中国在与共产主义越走越远。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给美国人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大变,并严重影响了之后数年的报道。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与中国发生的事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美国人心里结上了一个难解的结。当部分美国人欢呼“历史终结”的时候,它们实际上仍对

还有十亿多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耿耿于怀。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相对加强了。“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极权政府”甚至是“邪恶帝国”这些充满敌意的词汇后面,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中国的各种负面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所以会给别国造成威胁也是由于它不是“民主国家”。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关心人权的重点一直放在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很多文章和评论公开要求美政府支持推翻中国现政权,改变中国政体。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体进步没有在美国媒体上得到全面体现。在看待中国时,可以说美国媒体时时不忘“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立。这种意识可以说自然而然,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改变。

更应注意的是,美国人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抱有敌意,对中国的文明(文化)也满怀警惕。所谓“文明冲突论”就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很明显,文明即使难以真正融合,也不一定走上谁控制谁或谁支配谁的冲突之路。但美国媒体经常找出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它们把中国描绘成共产主义加民族主义加异族文明加经济威胁的混合体,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黄祸论”的味道。

3. 美国媒体敌视中国是担心中国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各种攻击,反映了在美国政界学界广泛存在的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美国真的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吗?那只能是一个“守规矩的”,听从美国领导的国家,而美国对中国心存深深的怀疑。不论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夸大,还是对中国军事意图的猜疑,那些“中国威胁论”的作者们都流露出对动摇美国支配地位的担心。长期以来,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防止任何一个除自身以外的大国在亚洲或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现在,一些美国战略分析

家环顾世界后，把中国当作了可能的对象。为此，美国媒体寻找种种证据，给中国罗织罪名。报纸上一会儿断定中国出口导弹，一会儿指责中国扩充武库，一会儿说中国威胁弱邻。结论不言自明，东亚的稳定迫切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因为在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这方面，那些作者们坚信只有“零和游戏”。

美国媒体大量地负面报道中国目的不仅在于敦促政府采取措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也着眼于维护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比如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报道，对贸易逆差的报道，对市场壁垒的报道，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报道等等，都营造了强大的国内压力，客观上增加政府在各种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环境、经济发展、不扩散、反毒等方面具有合作的必要和机会。但是，仅仅从美国媒体的表现中不难看出，两国也在相当多的方面存在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不仅涉及意识形态、文明差异，还涉及到世界秩序、行为规范、国家地位、领土统一、安全构想、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而且在短时期内不易消除。正是这些，构成了影响美国媒体态度的持久因素。从美国媒体总体表现来看，相当多的美国政界学界人士显然对两国以合作解决分歧缺乏信心，倾向于以施压和对抗维护美国利益。

4. 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任何有争议的对外政策都极易成为党派斗争和院外活动的对象，而冷战以后中国就成了在美国极易引起争议的国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问题和美国的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为媒体提供了攻击的炮弹，为其国内问题寻求依据或“替罪羊”，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美国的堕胎争论，贸易逆差问题与美国工人的工作等。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上缺乏总体设计和连贯性，目标和议程的先后次序不清，也导致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众说纷纭。国会共和党人趁机利用中国问题

大肆炒作，给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出难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而克林顿当年也曾攻击布什的中国政策。每年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斗都含有党派争斗的影子。虽然1996年大选前两党似乎就不再利用中国问题作为竞选筹码达成了默契，但最近的所谓政治献金案，党派斗争的背景又有显露。此外，各种反华院外集团，如亲台集团、军工产业、贸易保护集团、宗教保守势力等，也结成反华联盟，在各种媒体一唱一和，制造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国内政治因素也构成了影响美国媒体对华态度的持久原因。

上述四个原因中，比较之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对立（第二点）和两国总体及具体利益上的分歧（第三点）是美国媒体敌视中国的核心因素。虽然新闻习惯和商业利益（第一点）、国内政治（第四点）也都是起持久作用的因素，但正因为有了上述两点核心因素，其他原因才有了更多的发挥作用的余地。

美国媒体的报导与对华政策

美国媒体长时间的反华报道，给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形象，中美关系的议程和美国对华政策环境三方面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首先，美国媒体的反华报道在公众中塑造了一个内部缺乏合法统治、压制人权、腐败及违法活动猖獗，对外给别国造成威胁的，共产主义加民族主义加经济发展的中国形象，并把这一形象趋于固定，严重扭曲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虽然美国公众有时对媒体的报道也半信半疑，但他们在相当多的事情上（包括国际新闻）依然要依赖媒体的信息，形成印象，分辨利益^⑥。第二，美国媒体的报道从负面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议程，冲击改善关系的步骤。某些事件一经美国媒体大肆渲染，被夸大、戏剧化，往往打乱了中美关系的议事日程，增添许多麻烦，进而可能

影响全局。我们屡屡看到就在中美关系刚刚出现改善势头的时候，就被另一波反华舆论浪潮所冲击。如吴弘达事件、所谓政治献金案等。第三，媒体的反华报道毒化了美国国内处理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造成了不利的决策环境。处理中美关系的官员缩手缩脚，因为他们必须寻找顺应国内气氛的理由。支持对华改善关系的意见实际上受到舆论压制。

一般理论认为媒体处于外交决策的外缘，对外交政策影响有限。但对美国媒体长时间大规模的敌视性对华报道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原因有三个。首先，水门事件以后，美国国会、党派、舆论对行政部门的牵制总体呈加强趋势，而克林顿目前仍然难以说是一个强势总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一致性的衰减也为媒体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其次，媒体在对外政策上的作用一般随其国内政治含量而增加^⑥，而我们已经看出很多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已经和美国的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比如贸易逆差问题、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美国的堕胎争论等。在内外政策界线日益模糊的情况下，媒体的作用也呈上升趋势。第三，信息革命增强了媒体的时效性、覆盖面、感染力，加强了媒体的权力化。结果是，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决策的节奏被迫加快，选择余地相对减小。1989年美国媒体对“天安门事件”现场直播式的报道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影响制约外交决策，同时也受到来自政府和其它政治势力的影响，作用是双向的。政府举行的各种公关活动，包括记者招待会、吹风会等，不仅是媒体进行炒作的重要信息源，也是进行政治试探的气球。媒体反映的往往是某些政坛人物不便公开说的话。把主流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仅仅描绘成“天然冲突”的关系，恐怕过于天真。从不利于政府的方面讲，媒体对政府有制约作用；但从有利的方面讲，政府也可

以利用媒体制造舆论、释放烟幕，为随时可能的政策转向奠定舆论基础。曾有中国学者说，“所谓‘舆论’，既不是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是为美国统治集团一手操纵，也不是像有些美国人自诩那样完全是独立的、自发的。”^⑦

90年代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偏颇和敌意，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美关系正处于困难的调整时期。走向合作和走向冲突的可能是同时存在的。避免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对抗需要魄力、胆识和机遇。中国政府不能改变美国媒体的“习惯”，不能改变美国媒体的观念，不能否认两国的利益差异，当然更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但这不是说就不能作出努力影响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

首先，加强驻华外国记者的工作。统计数字可以表明，媒体上大量丑化中国或攻击中国的言论来自曾经或正在驻华的记者。究其原因，除去中国人不能改变的因素以外，恐怕也有如何管理和对待这些记者的问题。有关机构当然没有必要故意讨好这些外国记者，但让他们觉得身处比较自由的环境里，更容易地接触到正面的权威信息而不是挖小道消息，有更多的机会和普通中国人交流，都将利大于弊。就是对于曾经不友好地报道中国的记者，也应区别对待，尽可能争取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改变敌意态度，这样做可能更有利于加强舆论安全。

第二，改进对外宣传报道的技巧。对外宣传是让国外了解中国的又一个渠道，在西方传媒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对外国心怀恶意的报道要针锋相对，但除此以外，对国人关心的经济、社会领域更应作出有说服力的、形式多样的解释和报道。另外，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以对于国内宣传报道的引导应与外宣尽量一致，以避免引起误解。

第三，加强与驻华记者的关系和外宣报

道基本属于改善政府公共关系的方面，另一方面，民间外交的减震、缓冲作用也应予以重视，因为国外的观众读者们往往更乐于相信专家学者的言论。充分发挥那些既懂国家政策、又有学识素养和对外交流机会的民间人士的长处，利用国际讲坛，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让世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客观上就是对心怀恶意的报道的回击。另外，在海外的华人学者绝大多数也是爱国的，他们同样是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可以借助的力量。

注释：

- ① 关于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参见刘有源：《美国新闻事业概览》，《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8页，第96—106页。
- ② 在该报此段时间以中国为主题的目标下，总计403篇。除去实际上明显不应属于这一主题的，再加上附加于其他报道后的非独立的报道，笔者统计为377篇。这一数字或有微小误差。涉及多个问题的报道重复计算。
- ③ 参见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 ④ 见Walter Lippmann, "Newspapers", in

Doris Graber edit, *Media Power i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 CQ Press, pp. 37—42.

- ⑤ 见Doris Graber: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2nd ed. Washington D. C. :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4, pp. 375—376.
- ⑥ Graber 前引书, pp. 362—363, 另见: 戴伊, 前引书, 第162页。
- ⑦ 见杰里尔·罗赛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第467—468页。
- ⑧ 参见: Graber: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pp. 2—3; 另见: Commings/Wise: *Democracy under Pressure*, HBJ Publishers, 1985, p. 218; Graber: *Media Power in Politics*, p. 6.
- ⑨ 参见: Tsan—Kuo Chang: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orwood, New Jersey, 1993, p. 24. 另见 Spanier/Uslan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the Democratic Dilemmas*,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7, p. 18.
- ⑩ 资中筠: 《缓慢的解冻》, 《美国研究》第1卷, 1987年第2期, 第25页。

科研简讯

《1996：国际社会与文化》一书出版

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的《1996：国际社会与文化》一书，已于1997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4万字。

该书收录了该院教师近年来撰写的学术论文共26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中国文化与教育；国际社会、文化与传播；国际经济与环境问题；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梁守德教授任本书主编并撰写了前言。该书出版得到了台湾亚洲与世界社社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魏萼先生，以及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会、香港安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教授郭国耀先生的大力支持。

(木 易)